

缘起

——父亲和136部队

尤今

1942年2月，日本蹂躏的魔掌伸向了新加坡。在新加坡沦陷前，林谋盛和庄惠泉等一批活跃的抗日份子迅速撤离新加坡，他们在新加坡河渡口上船，一波三折地抵达了印度。

当时，由新加坡撤退至印度的英国军官巴素古费洛上校(Basil Goodfellow)、戴维斯上尉(John Davis)与布伦上尉(Richard Broome)正计划筹组一支特别部队前往马来亚，从事敌后反抗的秘密活动。他们认为要在马来亚登陆后潜入森林，欧洲人由于肤色的问题，一旦露面便危险地“露馅”了，所以，这项探刺敌后情报的重大任务，必须要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华人参加。他们在印度与林谋盛密谈之下，发现大家对策划反攻马来亚的计划都有着强烈的共识。

在多方奔波与沟通之下，1943年1月，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终于在重庆签署了协定，共同组织136部队，总部就设在印度的加尔

各答，总负责人是巴素古费洛，顾问是戴维斯与布伦，马来亚区正副区长则由林谋盛和庄惠泉分别担任。

双方的协议是：中国政府（国民党）指派人员前往印度接受军事训练，之后，潜入马来亚从事敌后秘密活动；英国政府则提供经费，负责调派、运送、指挥、布署等等事宜。

136部队分别在德里、本那、加尔各答及锡兰海军基地等处进行严峻的训练。第一批十余人，由林谋盛率领，飞赴加尔各答，改乘火车到本那接受训练。

训练的内容，以现代游击战术中的“黑色技艺” (Black Arts) 为主，包括各种武器的正确射击与使用，还有，各类偷袭与破坏的方式等等。受训期由半年至八个月不等。

艰辛、艰苦、艰难已极的训练过程结束后，便送往加尔各答，等候调派以潜入马来亚从事秘密活动。

136部队人员，以“龙”为徽号，第一批受训者称为“龙一”，第二批受训者称为“龙二”，余此类推，总共六批。

由1943年5月至1945年6月，龙队成员分成多次，乘坐潜水艇，潜入马来亚从事敌后工作，总数约有40余人。

父亲谭显炎于1918年出生于怡保，成长于怡保。当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疯狂大侵略后，这位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筹赈会的义务筹款活动。22岁那年，他结识了一名来自中国的罗姓朋友。罗先生到各地去举办时事展览会，展出大量日本入侵中国后滥杀无辜的照片，那种令人发指的兽行、那种人神共愤的残忍，使父亲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活动，他于1940年飞赴重庆接受军训，立志拿起枪杆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加入了136部队后，父亲谭显炎是“龙一”的成员，也是第一批潜返马来亚从事敌后抗日工作的人。

戴维斯在“攻不破的山林城堡”一文里，提及挑选第一批136部队特工人员在1943年5月11日潜返马来半岛时，如是写道：

“我们决定派出一支六人队伍，分成三条小船南下，每条船两个人，总共需要五名华人和一名欧籍人。我和布伦及林谋盛共同挑选最优秀的五个人。当时，我们挑选了亚韩（谭显炎）、亚清（李汉光）、亚吴（吴在新）、亚英（龙朝英）这四个华人，另外一名是加尔各答的海员，名叫亚彪。这支队伍就这样组成了。”

关于136部队所负的特殊任务，戴维斯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有很清楚的阐述：

“136部队在马来亚的任务，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开始时，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敌后进行破坏，所以，训练都集中在这一方面，随处都有炸药供练习之用。后来，马来亚沦陷了，再也没有情报来自该地，因而收集情报便成了首要之务；不论情报是来自特别行动部署组、秘密谍报组或是其他出处，都是非常珍贵的；而当我们潜入马来亚时，最为迫切的，就是设法去了解马来亚的实况。等我们同印度方面联络上以后，136部队的着重点就从谍报工作转变成抵抗日军和对日作战了。”

更明确地说，136部队受训人员共分两类：一类为军事情报员、一类为电讯员。他们的任务包括了收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再利用无线电把情报传回给印度的联军总部；此外，他们的任务也包括了与活动于马来亚森林里的人民抗日军携手合作，给他们提供军火、医药、粮食等等，为日后的反攻做好一切部署工作。

由许云樵教授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其中一篇“新马华人的敌后反抗”里，有以下一段文字：

“136部队所遣派来马来亚的人员虽为数不多，但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优秀份子，智勇兼备，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加强军火配备，增进物资供应，训练作战技术，沟通各方情报，使游击队充分发挥其制敌效果，先使其士气崩溃，俾正规军登陆反攻，收事半功倍之效。”

父亲谭显炎在马来亚形势险峻的美罗山上渡过了出生入死的两年零三个月，死神时刻在覬覦，但他每天都坚持了写日记的习惯。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这份由父亲谭显炎撰写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因此得以流传至今。